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财政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王伟同¹，崔惠玉²，谷 成²

（1.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任务，也是提升财政学学科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内在要求。本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财政学的探索历程、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重点提炼东北财经大学在财政基础理论构建、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中形成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标志性成果。研究表明，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植根于中国实践、服务于国家治理，呈现鲜明的主体性、本土化和体系化特征。东北财经大学作为新中国财政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财政基础理论构建和财政史研究、基于市场化改革经验的财税理论原创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财政理论创新等方面作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贡献，形成了以史鉴今、问题导向、理论原创、知行合一的学术传统，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学理支撑、实践经验和学科范式。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进一步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强化标识性概念提炼、原创性理论建构和体系化知识整合，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关键词：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东北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6)06-0022-15

一、引 言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形成、演进、职能配置和制度安排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部历史过程^[1]。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财政学亟须围绕中国财政为何如此运行、何以如此变迁、未来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形成更具解释力、概括力和引领力的理论回应。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收稿日期：2026-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23&ZD062）

作者简介：王伟同（1980-），男，河北峰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区域经济、劳动经济研究。E-mail: wangweitong99@sina.com

崔惠玉（1975-），女，辽宁庄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管理研究。E-mail: cuihuiyu@dufe.edu.cn

谷 成（1975-），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税收政策研究。E-mail: gucheng@dufe.edu.cn

和中国实践,从中国典型事实和制度特征出发,提炼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以此深化对中国财政运行规律和制度变迁逻辑的认识。同时,应推动既有研究由分散性探索走向系统化建构,逐步形成由基本概念、范畴、理论及相应教材、课程、教学体系共同支撑的相对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

尽管中国财政学围绕财政本质、财政职能、财政体制和财政改革等问题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对象界定、核心概念提炼和本土理论建构等方面仍有不足,尚未形成能够系统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的成熟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为基本线索,系统梳理中国特色财政学的探索历程、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重点提炼东北财经大学在财政基础理论构建、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中形成的标志性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新时代以来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经验,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财政学学科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进路,以期为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二、财政学科发展简史

财政学在国家财政实践和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从学科发展脉络看,财政学主要经历官房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三个阶段。受时代环境与国家治理需求影响,各阶段的财政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各有不同。

(一) 官房学时代: 财政学的早期形态与国家财政管理思想的形成

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受重商主义思潮影响,德国官房学派以国库行政为核心,围绕租税征收、经费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构成了财政学的早期形态^[2]。官房学中的“官房”原指王室或国家财政机构,与财政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3]。随着近代欧洲国家的发展,战争支出与行政开支持续扩张,稳定财政收入、规范国家财产管理、夯实经济基础、提升行政治理能力,成为当时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为官房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官房学将财政收支、行政管理、经济建设与国家治理统筹结合开展研究,强调国家土地和产业是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4],主张通过财政层面的开源节流举措提升行政效率,增强国家行政、经济与军事综合能力,进而优化社会治理、增进社会福利^[5]。该理论体系虽未形成成熟的学科框架,但已涵盖公共收入筹措、税源培育、国家财产管理、财政能力建设等丰富的早期财政研究内容。总体来看,官房学立足国家治理与财政管理实践,初步厘清了财政收入、经济发展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积累了丰富的早期财政研究成果,为后续财政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 政治经济学时代: 近代财政理论的形成与展开

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财政问题被正式纳入市场经济分析框架。古典财政理论的重要研究者在《国富论》一书中探讨了财富的本质、分工的角色及市场如何运作,并将财政问题置于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分析。斯密提出的公平、确定、便利、节约四大税收原则^[6],确立了近代税制设计与税收征管的基本准则,围绕政府财政收支、国家公债管理等核心内容,搭建起古典财政基础分析框架。在斯密的研究基础上,李嘉图^[7]进一步拓展古典财政理论的研究内容,重点围绕税负转嫁机制、公债经济效应、财税政策与国民财富分配的内在联系展开研究,系统阐释了财税制度对市场经济运行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作用逻辑,丰富了古典财政理论体系。该阶段的财政研究契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明确了近代财政的运行准则与职能定位,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经济学时代: 现代财政学的形成与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

20世纪以来,财政学逐步融入现代经济学分析体系,实现了由传统财政收支研究向现代公

共财政研究的转型。这一阶段的财政学研究重点考察政府财政活动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确立了现代财政学的基本研究框架。面对市场机制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Pigou^[8]将财政活动与外部性矫正、社会福利改善相结合，注重基于福利标准的规范经济分析，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市场缺陷、介入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Samuelson^[9]认为，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有效供给，需要政府依托财政职能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明确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边界。马斯格雷夫对现代财政理论进行系统性整合，明确了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三大基本职能，同时提出有益物品理论，构建了体系完整的现代公共财政分析体系^[10]。公共选择理论拓展了传统财政学的研究维度，将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要素纳入财政研究范畴，打破了财政决策服从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单一预设，为解读政治行为、优化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效率提供了全新视角，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体系^[11]。

三、中国特色财政学的探索历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年

1. 经济的计划统一性与财政的国家主体性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从奠基到定型的核心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被赋予了鲜明的国家主体性。这一时期，中国以国家主体性的强化为依托，实现了主权独立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为后续的改革开放积淀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并非聚焦于单纯的技术性收支管理，而是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落实，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以高度的集中统一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

2. 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萌芽与发展

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服务于国家的分配属性，催生了诸多围绕财政与国家关系展开阐释的理论。1964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辽宁省旅大市（现辽宁省大连市）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会议上，除国家分配论外，还涌现了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等学术观点。

一是国家分配论。丁方和罗毅^[12]认为，财政涵盖政府收支及其管理与运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财富在国家机构的部分流入流出，本质上是国家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与再分配行为。通过分析财政与国家关系，许廷星^[13]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财政学的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简言之，也就是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家对社会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关系。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诸多学者共鸣。邓子基^[14]认为，财政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是以国家为主体、以无偿原则为特征的一种分配关系。陈共^[15]则进一步界定了财政本质，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主要体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二是国家资金运动论。以李成瑞为代表的学者持有与国家分配论相似的观点，认同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李成瑞^[16]认为，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包括国家预算、国家银行信贷、国营经济各部门和国营企业财务；社会主义财政具有分配资金和组织资金周转的职能；财政工作应当为国家管好资金和资金的整个运动过程，并处理好这些资金在运动中的种种经济关系。

三是价值分配论。该理论的代表性学者王恒坚^[17]认为，财政是对社会产品价值进行分配的活动，既与国家有本质联系，又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财政现象是随着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矛盾的发展、价值形态的演进、价值分配现象的出现及国家职能的拓展而逐渐形成的。

上述理论虽观点不同，但均立足于财政的实践定位，深化了对财政本质属性的认知，并对当时的财政职能作出了理论回应和现实指引。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1.市场化改革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在“放权让利”中重塑微观主体与央地关系，财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扮演着直接驱动经济增长、承担改革成本的角色，呈现较为明显的“生产建设型财政”特征。

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分灶吃饭”体制打破了上一阶段“统收统支”对地方积极性的束缚，随后推出的两步“利改税”，试图以税收形式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改为缴纳税款。这一时期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虽激发了区域的竞争，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却逐步导致“两个比重”严重下滑，较大幅度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使统一市场建设受阻。

纵观这一时期，财政体制的每一次调整均在回应市场化对利益激励、微观主体活力和统一市场的需求，而财政也始终作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支付者和工业化资本的核心来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渐进式改革中，承担着建设者和保障者的双重角色。

2.国家分配论的延续与调适

改革开放后，随着财政实践角色发生转变，财政学界也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陆续涌现诸多延伸性或创新性的理论思考。

一是再生产前提论。作为该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陈共^[18]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归根结底是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在财政工作中，初次分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的比例等具体事项，均必须按照再生产的原理加以处理。侯梦蟾^[19]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大部分投资必须由财政集中安排，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财政内在于再生产过程，是该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是社会共同需要论。代表性学者何振一^[20]认为，财政并非由国家产生，而是来源于社会共同需要。即财政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所产生的分配关系。

三是剩余产品决定论。基于对财政本质的分析，王绍飞^[21]认同社会共同需要是财政关系的经济实质，并进一步提出这种社会共同需要是因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其逻辑在于，财政关系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其发展水平由生产力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财政关系也由此逐步形成，并伴随剩余产品的增加而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关系体现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是在坚持国家分配论基本立场的基础上，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积极尝试，本质上均旨在回应经济发展对财政职能提出的新要求。

（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1992—2012年

1.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初步建立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财政领域的分税制改革应运而生。分税制改革的具体举措包括重新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实行按税种分税而非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等，使财政有能力承担起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国企脱困及重大产业布局等职能，为国家在统一市场框架下融入全球化奠定了资金基础。

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初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标志着中国财政体制从适应计划经济的建设型财政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公共财政全面转型。21世纪以来，财政改革的重心逐步从总量调节转向制度建设，一系列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相继铺开。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体系，财政由此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

型工具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治理机制的范式转换。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表明，财政制度的演进既是国家战略主动引导的结果，也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熟过程中国家治理要求的适应性调整，二者的互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转型的独特路径。

2. 公共财政论的确立与发展

公共财政制度体系的建立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引入，使中国学者开始注重财政理论与实践中的公共财政要素，二元结构财政论、公共财政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财政学界发展迅猛。

在中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之前，叶振鹏^[22]认为，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行使着双重经济职能，即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全民生产资料所有者职能。这决定了国家的分配行为同样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它们各有其具体的职能和任务。叶振鹏在后续研究中将这种财政架构称为“二元结构财政模式”。安体富和高培勇^[23]将国家财政的职能总结为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认为构建中国公共财政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从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出发，对现存的财政职能事项逐一鉴别、筛选，避免财政职能的“越位”“缺位”。

随着公共财政论日益广泛地产生影响，当时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张馨^[24]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协调，并为其提供有效支持。理解公共财政内涵有助于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推进财政改革、优化财政运行方式，从而提高中国财政工作的整体效能。邓子基^[25]则在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其认为，公共财政论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分配论，但公共财政论也有部分思路、观点或方法值得国家分配论学习和借鉴，如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配合、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理念、提高财政的法治化程度等。

总体来看，受公共财政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开始系统探讨中国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完善路径，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提供了有力的学理依据和理论支撑。

四、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新时代以来，中国财政学在既有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立足新的发展要求和改革实践，不断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基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从根本上超越了经典公共经济学中将财政作为经济工具的传统认知，将财政定位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枢纽的核心高度。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财政的功能边界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领域，而是全面嵌入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治理维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得到了财政学界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诸多学者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对财政理论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基于对财政职能的进一步思考和界定，高培勇^[26]认为，财政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其职能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所有领域。在国家治理论的基本框架下，陈共、郭庆旺、刘晓路、吕冰洋等学者对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以陈共重新思考财政学对象为基础，刘晓路和郭庆旺^[3]发现，财政学发展中国国家治理理念与财政形态存在对应关系。吕冰洋^[27]认为，国家治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而财政制度安排则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这些围绕国家治理进行的财政理论创新不仅对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国家战略思维形成了理论回应，也为进一步优化财税体制提供了方向。

（二）基于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的理论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对财政支持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要求。近年来，

财政政策主动适配这一转型,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上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从基本生存保障向发展能力提升领域延伸,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向更高质量、更广覆盖转型。同时,通过转移支付、消费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财政精准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着力缓解民生负担、激发消费潜能,有力回应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对财政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财政学者在理论层面对财政本质和分析范式进行了创新研究。邓力平^[28]认为,中国财政的本质属性是人民财政,其根本任务是“人民财政为人民”,这种本质属性在长期改革发展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并与时俱进地被赋予了特定要求;未来,人民财政不仅要为现代国家的财政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更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李俊生和姚东旻^[29]构建了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的核心要义在于,政府与市场不再是传统的对立关系,而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有效合作的关系。在合作和博弈中,双方的目标均能够顺利达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三) 基于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理论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衰减、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和国内经济深刻转型相互叠加,对中国宏观治理体系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难发现,财政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显著的战略主动性。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从传统的总量扩张转向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通过减税降费、专项债扩围及支出结构优化等举措,有效平抑了产出缺口,撬动了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创新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机制,重点应对地方债务风险问题,不仅实现了存量风险的缓释,也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货币政策的过度对冲引发的道德风险,深刻彰显了财政在宏观治理中的核心支柱作用。

面对国内外风险叠加的挑战,基于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理念,中国财政学者积极推进财政理论创新。刘尚希等^[30]立足于公共风险论视角,对当前中国公共债务问题进行剖析,认为未来既应优化政府治理体系,明确界定风险责任,有效识别和预警公共风险,还可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协同防范公共风险。杨志勇和樊慧霞^[31]构建了新财政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下一步财政改革应聚焦优化财政机构设置,进一步厘清国家治理与市场治理的边界,并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总体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政学者不仅对积极财政政策开展了理论探索,更针对其中的风险隐患和外部冲击进行了系统分析,有力回应并支撑了当前的财政实践。

通过对财政实践和理论演进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和国家建设紧密相连。正是这种扎根现实、回应时代的内生逻辑,使财政理论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五、探索中国特色财政学和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一) 奠基性贡献: 财政基础理论构建和财政史研究的东财作为

计划经济时期,在引入苏联模式和中国积极探索自我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下,马大英、孙文学、刘明远、刘焕珍等学者长期深耕于财政史、财政基础理论等领域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为探索与争鸣时期形成对财政本质特征和职能作用的共识性认识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1. 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开创与体系化构建

马大英注重从历史研究中认清财政本质及财政体系问题,自20世纪40年代起,他长期从事财政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财政史、财政学等领域建树卓著。1947年,马大英编著的《中国财务行政论》是中国财政学科的重要奠基之作之一。1952年起,马大英担任东北财经学院财政教研室副主任,先后翻译了多部著作,对当时的财政学教学助力良多。20世纪80年代后,马大英致力于中国财政史的整理编撰工作。《汉代财政史》一书对财政管理、官署设置、审计监督等具体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该书被视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较早问世的断代财政史专著。在利改

税背景下,马大英^[32]阐述了税收的本质、原则及税收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为后续税收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秉持“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的治学理念,孙文学长期专注于财政理论和制度、中国财政史及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其主编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思想史》等著作从多维度揭示了中国财政思想的起源与演变,部分著作面向全球公开发行,有力推动了中国财政学话语的国际传播。面对财政的本质及财政与国家政权、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基于从历史实践中寻求答案的研究思路,孙文学^[33]认为,研究中国财政的现状,不能不研究中国财政的历史;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也不能不研究中国财政的发展史。除了梳理中国财政史实,孙文学^[34]还注重系统总结中国财政思想,认为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在承前启后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充实、积淀,形成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

2.国家分配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系统化阐释

曾获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的刘明远,从教以来始终深耕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他打破传统理论束缚,立足中国财政实践和调查研究成果,提炼形成了关于财政及其运行逻辑的基础理论认知。基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经验和财政实践,刘明远系统剖析了社会主义财政的性质和作用,以此回答新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财政的现实问题。1964年,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辽宁财经学院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中对财政学问题进行研讨的学术会议。刘明远和谷祺共同提交了“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与范围”的研究成果,主张从国家分配的角度理解财政的实质和范围,提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后期的研究中,结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观点,刘明远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财政的理解。刘明远^[35]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建设财政,财政应以积累、分配和管理资金为中心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一理论观点契合以政府主导经济运行助推工业化的现实背景,并有力回应了国家经济建设与财政职能作用内在联系的理论诉求。刘明远对社会主义财政的这种真知灼见,体现在1980年他与邓子基、王亘坚共同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中。该教材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的第一部财政学统编教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财政学学科建设的起步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3.国家预算理论的体系化、规范化奠基

刘焕珍是国家预算、财政平衡和宏观协调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先后编撰多部国家预算相关教材,将国家预算、行政事业财务等领域知识体系化、规范化,对财政学科特别是预算教学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针对国家预算与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问题,刘焕珍^[36]认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联系十分紧密的两大宏观调控工具。经济决定财政、财政积极反作用于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要正确处理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应综合考虑国家建设需要和国家财力可能,并通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维持综合平衡。这种兼顾发展和稳定来思考国家预算的理论思路,对于解决当时的财政问题 and 理解当下的财政实践均具有一定启示。

(二)原创性贡献:基于市场化改革经验的财税理论原创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逐步调整,财政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刘永祯、张复英、王佩苓、马国强、解学智、寇铁军、吴旭东、李松森、孙开等学者围绕转型时期的财政宏观调控和财政平衡、预算会计、税收制度改革、城市财政学、财政政策等核心议题作出思考,为理解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财政提供理论依据。

1.形成中国财政宏观调控的本土化理论创新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通过财政体制改革破除对经济运行的制度性约束至关重要。刘永祯长期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财政领域出现的核心矛盾和现实问题,在研究视角上,结合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具体实践,紧扣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展开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更主张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和表象来分

析中国现实。尤其是对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刘永桢^[37]不仅从收支角度解读财政平衡,还将财政平衡置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框架下加以把握,认为应该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发挥财政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围绕是否应以赤字预算刺激经济发展的争论,刘永桢^[38]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赤字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量力而行、预算收支平衡。张复英也围绕国家预算运行、预算会计核算及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等内容,对当时较为分散的知识进行了系统整理,他先后出版的《国家预算》《预算会计》等著作成为当时高校课程教学的重要参考。这些观点和成果充分体现了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在资料匮乏年代的自主创新特质,他们并未盲目照搬他国经验,而是坚持结合本国实际辩证认识、具体分析财政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

2.建构以“一般报偿性”为代表的原创性税收基础理论

在改革开放初期,既有的税收制度与现实经济发展不匹配,难以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关注税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及转型时期税收制度改革的创新设计,阐释税收本质、税收分配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在深入认识税收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基础上,王佩苓结合历史剖析税收作用,并将税收置于更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加以分析。王佩苓^[39]认为,税收并非单纯的经济范畴下的财政收入形式,而是内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并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基于对传统税收理论的深刻反思,马国强致力于建构适配市场经济的税收基础理论,以此阐释税收职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推动了税收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于转轨时期的税收理论研究,马国强认为,应从社会存在及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认识税收的目的^[40]²¹,从理解国家本质一般与特殊中认识税收本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40]³⁰,以此形成转轨时期税收职能作用的理性认识。此外,截至2025年,马国强主编的《中国税收》教材已出版至第11版,系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在国内财税教育界影响深远。该教材以税收的“整体报偿性”替代传统“无偿性”的表述,具有创新性学术价值^[41]。通过实事求是地深刻剖析传统税收制度,张振斌和解学智^[42]认为,把税收制度建立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作为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税收制度改革目标的基本构想。这些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面向不同时期税收制度改革的主题,剖析和阐释税收制度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及税收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动力,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税收制度的价值、结构和功能。

3.搭建填补城市财政学学科空白的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框架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结合城市财政工作经验,积极探索中国在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财政分配关系及其规律。为了迅速填补财政学学科中“城市财政学”领域的空白,198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城市财政研讨会上,徐日清、张复英、麦履康等学者联名发起编写“城市财政学”教材;1981年,编写组在西安召开的第二次城市财政研讨会上进行编写分工,并先后用了三年多时间完成《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43]¹。其中,张复英编写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并参与修改总纂。当时,针对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存在的争议,《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明确,与资本主义城市财政学的小范围不同,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是大范围的。^①这种观点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打破了资本主义城市财政学的思想束缚,强调从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及城市与财政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确定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理论框架。在城市财政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张复英认为,财政支持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尊

① 所谓大范围,是指城市财政学的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城市经济活动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资金活动;其二,城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财政资金活动;其三,城市建设方面财政资金活动;其四,城市行政管理方面财政资金活动。所谓小范围,是指城市财政学仅以后三个方面内容为限,第一方面内容不包括在城市财政学范围之内^[43]⁷。

重规律、量入为出、讲求效益、厉行节约和依靠群众，充分认识实践的发展，并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以此为依据动态调整城市建设资金安排和分配领域。这些观点和思路契合当时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现实，对于理解当下财政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揭示转型时期财政本质的财政学理论建构

立足市场化改革的新实践、新要求，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进一步加深对中国财政本质的认识。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揭示了财政与国家的内在联系及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厘清财政属性与经济属性的边界，将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从财政分配范畴中剥离，是转型时期理解财政本质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寇铁军结合其对财政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理解，主编《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管理》等教材。部分教材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并多次再版，成为国内财政学教育的重要参考读物。吴旭东主编的《税收管理》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统编教材，多次再版并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在税收管理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对规范税收管理课程教学、培养税收专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松森则专注于国有资产管理理论构建和政策分析，他基于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和发展，提炼出两种属性分配理论，即财政分配包括两种属性，一种是公共属性，对应于税收分配；另一种是经济属性，对应于国有资本分配。该理论在指导国有资产管理和财政政策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李松森认为，国家主权是财政政策的一般理论依据^[44]⁵，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财政政策的一般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44]¹¹。在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方面，孙开在其专著《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指出，政府财政具有清晰的层次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与具有不同受益范围的公共产品密切相关；分割税收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能够发挥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作用^[45]。进一步地，孙开围绕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横向转移支付、财权事权匹配等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其相关观点为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这些观点表明，理解中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和财政政策工具选择，必须将财政政策置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中来认识，以此剖析财政政策如何适应国家职能转换的客观要求，从而得出中国财政政策的运行规律和理论依据。

（三）新时代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财政理论创新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改革目标，指向财政制度建设应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在把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完善体制机制设计。围绕现代财政制度的应有要义、重要构成和改革路径等核心议题，吕炜、王伟同、谷成、崔惠玉等学者紧扣财政实际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致力于构建具有解释力的中国财政理论。

1.提出包容性财政体制原创性理论

不同历史阶段下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过程揭示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制度发展路径和轨迹。随着财政被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财政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作出系统性思考，回应财政如何通过自身改革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推进财政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基于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深耕，吕炜在总结财政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财政发展的理论逻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本质内涵和内在要求为逻辑主线，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本质、功能和规律进行理论归纳。从研究视角来看，吕炜的诸多研究均以财政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从中提炼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创新性的研究风格，成为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46]。更为重要的是，吕炜和王伟同^[47]创新性地提出了包容性财政体制理论，他们认为，在包容性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非规范性收入给予有条件容忍，地方政府会追逐以非规范性收入为代表的自主可控财力。这一理论对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作出了重要拓展。此外，吕炜长期探究财政之于国家治理和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涵逻辑,深入剖析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下财政对中国道路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当下从财政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48]。

2.围绕现代财政制度的多维度理论创新

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聚焦税收制度改革、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制度等细分领域,总结财税体制改革经验。纵观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体围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展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涵盖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具体内容。基于对改革思路的长期关注和对改革要求的深度理解,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以自身研究领域为切入点,力求梳理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事实依据、基本经验和实践效果,以期将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概念化、理论化。具体地,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谷成通过充分考量传统理论对中国实践的不适用性、理性认识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将政府间税收划分、税收职能、税收确立方式、税收征管、国际税收竞争、税收制度改革和税收理论构建等议题置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并作出新的解读。在专著《税收与现代国家治理》中,谷成探讨了如何使政府的征税行为更好地服务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围绕提高税收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及使税收理论体系更有力地解释与服务经济现实作出了重要探索^[49]。在现代预算制度研究方面,崔惠玉等^[50]立足于零基预算的核心要义,分析国外零基预算改革经验和中国零基预算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协同式预算管理创新角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零基预算改革路径。

(四) 集成贡献: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一体化发展的系统框架

东北财经大学不仅在中国财政学理论创新方面作出了系统性贡献,更形成了“理论原创—教材体系—课程平台—人才梯队”一体化的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系统框架。自1952年建校伊始,东北财经大学始终持续办学、薪火相传,长期参与并推动全国财政学教材建设、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成为中国特色财政学可持续创新的重要载体。

在理论原创层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从计划经济时期马大英、孙文学等学者对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深刻揭示及对财政史研究范式的贡献,到改革开放以来刘永祯、张复英等学者对财政宏观调控、预算会计、城市财政学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再到新时代吕炜等学者对财政与国家治理、财政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系统阐释,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始终保持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已成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材体系层面,东北财经大学始终是全国财政学教材建设的重要基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将学术研究有效融入人才培养,编写出一系列重要教材。从早期马大英等学者翻译国外著作、将世界财政理论引入国内教学,到马国强主编的《中国税收》、寇铁军主编的《财政学教程》等教材多次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再到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财政思想史》面向全球公开发行,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编写的教材覆盖了财政基础理论、税收学、财政史、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完整、迭代更新的教材体系。2025年,由郭庆旺担任主编、吕炜担任副主编,王伟同和崔惠玉参与编写的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中国财政学》出版发行,该教材已成为部分高校财政学课堂的重要参考。这些教材在国内高校被广泛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财政学话语的传播。

在课程平台层面,东北财经大学以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建设为抓手,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课程平台。2003年,“税法”获评辽宁省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税收”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同年税收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2010年,财政学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2012年，“税收理论与政策”获批辽宁省研究生精品课程；2019年、2020年，财政学、税收学专业先后入选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政府预算（政府预算管理）”于2020年、“税收原理”“中国税收”于2025年分别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3年，“税收理论与政策专题”课程获批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立项。此外，2013年，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8年，“创新工作坊—财园税务师事务所”获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这些课程和平台建设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落地提供了重要依托，实现了知识体系从构建到课堂传播的有效衔接。

在人才梯队层面，东北财经大学形成了结构合理、持续发展的财政学人才队伍。马大英、孙文学、刘明远、刘焕珍等老一辈学者奠定了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学科根基；刘永祯、张复英、王佩苓、马国强、解学智、寇铁军、吴旭东、李松森、孙开等中坚力量推动学科不断深化；以吕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已成为新时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财政学者。目前，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学科已涌现出诸多入选国家级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中国财政学会或中国税务学会重要职位的高水平学者。东北财经大学培养的一大批财政学专业优秀校友广泛就职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高校院所及企事业单位，已成为各行业的中坚力量。这种“传帮带”的学术传承机制与政产学研贯通的人才培养格局，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五）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经验与时代回应

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总结既有理论成果和学科经验的基础上，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命题，不断提升中国财政学的理论解释力、现实回应力和学术影响力。

1. 东北财经大学构建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与思考

（1）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质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及东北财经大学的长期学术实践来看，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财政实践、财税制度变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知识体系，其核心特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是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国财政学的主体性，根本在于其研究重心始终落在中国财政运行和财政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财政本质、国家分配关系和财政主体属性展开的讨论，到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财政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公共财政建设形成的理论研究，再到新时代围绕国家治理、现代财政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新命题，均表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基础。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始终紧扣中国财政现实，围绕国家建设、体制变迁和财政改革中的重大命题持续展开，形成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

第二，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贯通，构成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特征。财政并非单纯的收支安排，而是始终嵌入国家建设、制度演进和治理运行之中。财政问题始终同国家任务、制度安排和治理目标紧密联系。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必须放在特定历史阶段、制度环境和改革进程中加以把握。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者长期以来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重视从国家发展阶段和制度变迁背景中理解财政运行规律，重视从中国历史进程中把握财政改革的内在脉络。鉴于此，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从中国历史进程和制度结构中揭示财政运行的深层机理，形成能够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的学理表达。

第三，理论与政策研究相互支撑，构成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财政学既要回答财政本质、财政职能和国家分配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也要回应财政如何运行、制度如何调整、政策如何实施等现实议题。中国财政学能够不断发展并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同理论与政策研究之间的持续互动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财政实践的理解和分析提供学

理支撑,政策研究则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推动理论视野拓展和理论命题深化。东北财经大学在财政基础理论、财税体制改革、预算管理和宏观财政政策等领域形成的持续研究积累,充分说明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既表现为理论命题的不断丰富,也表现为其对现实运行、改革实践和政策规律的解释能力不断提升。

第四,学术研究、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推进,构成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积累和延续的重要支撑。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不仅体现为概念、观点和命题的不断丰富,也体现为相关知识内容在教材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得以传承,并逐步转化为推动学科发展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动力。换言之,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涵盖理论创新、系统阐释、教学转化和学术传承等多个环节。东北财经大学在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积累,体现出财政学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特点。这表明,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持续推进理论研究,也需要不断加强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从而为相关知识的积累、传播和延续提供更加稳固的支撑。

(2)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审视与思考

在肯定已有探索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还存在若干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首先,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凝练尚显不足,亟待形成能够深刻反映中国财政实践特征、具有较强解释力和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其次,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财政学的解释和回应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灵活就业、新型消费及人口结构变化等新现象不断涌现,财政实践面对的经济基础、治理对象和政策场景发生深刻变化,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及时回应这些新问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对新时期财政实践和财政治理问题的研究。再次,处理好学科自主发展与开放借鉴的关系。如何在吸收借鉴中推进本土转化,如何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坚持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表达,仍是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最后,理论创新成果向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转化的机制仍需健全。当前,部分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尚未充分转化为课程内容和教材资源,其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支撑作用仍有待加强。

2.新形势下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境遇与未来进路

(1) 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考验。从机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为财政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厚的实践基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任务持续展开,深刻影响财政的职能定位、制度安排和政策目标,并不断提出新的财政议题。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这使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命题的重要学科任务。从挑战来看,新时代财政实践所处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发展模式调整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持续改变财政运行的基础条件和制度背景,也使财政问题的表现方式、作用机制和治理要求更加复杂。既有研究框架在解释若干新情况、新问题,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如何在开放借鉴中提升自主解释能力的问题。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立足本国实际,吸收国外有益观点和研究方法,在比较、借鉴中形成能够解释中国财政运行、财政改革和财政制度特征的理论表达。

(2) 新时代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略与远景展望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实践,围绕

中国财政运行、财政改革与财政制度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能够有效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夯实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基础。应更加重视财政学研究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之间的有机衔接,推动相关研究成果更好融入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实践。应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完善学术平台和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与教学训练之间的有机联动,使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体现在学术成果积累上,也能够落实到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其次,加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支撑。应从财政学视角观察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问题,进一步增强对中国财政制度特征、财政运行规律和财政改革逻辑的系统认识,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最后,增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表达。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从中国财政实践出发,形成能够准确解释中国财政制度特征、财政改革逻辑和财政运行方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也要在开放视野中加强与国际财政学研究的沟通与对话,不断提升中国财政学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

六、结 语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财政学界立足中国财政实践、服务国家治理需要、回应财税改革任务的持续探索过程。其发展历程表明,中国财政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主体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史鉴今、问题导向、理论原创、知行合一。无论是围绕财政本质、财政职能和财政体制展开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面向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联系而形成的理论拓展,均体现了中国财政学在回应现实财政问题中推进知识积累、概念提炼和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北财经大学作出了系统性、标识性和开创性贡献。作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重要发展者、中国财政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税收基础理论的重要创新者、城市财政学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以及包容性财政体制和中国式现代化财政问题研究的重要探索者,东北财经大学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标志性成果,积淀了较为稳定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学科基础和人才基础。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扎根中国实践,强化标识性概念提炼、原创性理论建构和体系化知识整合;又坚持自主发展与开放借鉴的辩证统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吕炜.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指南[N].经济日报,2021-10-25(10).
- [2] 王国清.公共财政:财政的公共性及其发展[J].经济学家,1999(6):91-97.
- [3] 刘晓路,郭庆旺.财政学300年: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6,37(3):5-13.
- [4] 马珺.财政学:两大传统的分立与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0):63-73.
- [5] 刘晓路.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制度变迁[J].财政研究,2022,(05):49-58.
-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93.
- [7]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56.
- [8] PIGOU A C. Some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1,41(3):287-302.
- [9] 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36(4):387-389.
- [10]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邓子基,邓力平,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6.
- [11] BUCHANAN J M. The pure theory of government finance: a suggested approac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49,57(6):496-505.
- [12] 丁方,罗毅.新财政学教程[M].北京:十月出版社,1951:3.
- [13] 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J].财经科学,1957(2):61-77.
- [14] 邓子基.略论财政本质[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3):115-123.
- [15] 陈共.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和范围问题[J].经济研究,1965(8):27-34.
- [16] 李成瑞.从实践中的若干体会来谈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和范围问题[J].经济研究,1965(8):14-26.
- [17] 王亘坚.深入探索财政规律发展财政基础理论[J].财政研究,1992(2):8-14+24.
- [18] 陈共.《资本论》和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J].财政研究,1983(2):6-17.
- [19] 侯梦蟾.关于社会主义财政以再生产为前提的几个问题[J].财贸经济,1983,4(5):16-18+11.
- [20] 何振一.财政起源刍议[J].财贸经济,1982,3(3):26-29+33.
- [21] 王绍飞.关于财政本质的探讨——论剩余产品是财政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决定因素[J].学习与思考,1982(2):1-11.
- [22] 叶振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构财政职能[J].财政研究,1993,14(3):25-31.
- [23] 安体富,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的构建[J].财贸经济,1993(4):13-17.
- [24] 张馨.论公共财政[J].经济学家,1997(1):95-102.
- [25] 邓子基.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J].财政研究,2000(1):51-55.
- [26] 高培勇.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J].管理世界,2015(12):4-11.
- [27] 吕冰洋.“国家治理财政论”: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J].财贸经济,2018,39(6):14-29.
- [28] 邓力平.人民财政:共和国财政的本质属性与时代内涵[J].财政研究,2019(8):3-12+59.
- [29] 李俊生,姚东旻.互联网搜索服务的性质与其市场供给方式初探——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8):1-15.
- [30] 刘尚希,石英华,武靖州.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的失灵——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反思[J].管理世界,2017(1):5-16.
- [31] 杨志勇,樊慧霞.新财政治理理论:大国财政与全球经济新秩序[J].地方财政研究,2016(1):20-27.
- [32] 马大英.简论税收的本质及其分配原则[J].财经问题研究,1984(5):56-63+69.
- [33] 孙文学.中国近代财政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2.
- [34] 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 [35] 刘明远.财政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J].财经问题研究,1980(2):42-47.
- [36] 刘焕珍.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C]//中国财政学会.第五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219-227.
- [37] 刘永祯.控制通货膨胀率推动经济走出“疲滞”谷底的财政对策[J].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0(3):45-49+33.
- [38] 刘永祯.浅谈预算赤字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1981(1):47-49+58.
- [39] 王佩苓.论税收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关系[J].财经问题研究,1985(1):56-61.
- [40] 马国强.转轨时期的税收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41] 马国强.中国税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4.
- [42] 张振斌,解学智.论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J].财贸经济,1986,7(4):19-23+27.
- [43] 徐日清.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44] 李松森.两种属性分配理论与财政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 [45] 孙开.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1-2.
- [46] 吕炜,张妍彦,周佳音.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J].经济研究,2019,54(9):25-40.
- [47] 吕炜,王伟同.中国的包容性财政体制——基于非规范性收入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21(3):46-64+205.
- [48] 吕炜,靳继东.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165-184+208.
- [49] 谷成.税收与现代国家治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2-26.
- [50] 崔惠玉,徐思维,楚文月.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与协同式预算管理创新研究[J].财政研究,2025(1):26-38.

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Public Finance: Exploratory Journey of Public 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ANG Weitong¹, CUI Huiyu², GU Che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 a majo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for advancing the prosperit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enhancing the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practica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Chinese scholarship.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history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grounded in China's fiscal practices shows that the key to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both autonomy and explanatory power lies in maintain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foster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tegrating history with theory, and unify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Second, the public finance discipline a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s long cultivated fields such as foundational fiscal theory, fiscal history, taxation theory, urban public finance,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and the modern fiscal system. It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the compensatory function of taxation, socialist urban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clusive fiscal system. These contributions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disciplinary experience for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public finance.

Compared with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fi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its main threa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ploratory journey of public 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public finance has been constructed in China. It focuses on distilling the landmark contributions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foundational fiscal theory, fiscal and tax reform research, textbook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ts public finance discipline as an important case in building this knowledge system. Second, the paper further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public finance, and proposes possible future path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public financ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ethos.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 刘欣琦)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6.002

[引用格式]王伟同,崔惠玉,谷成.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财政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J]. 财经问题研究, 2026(6): 22-36.